

《海东传道录》和《青鹤集》所述韩国道教传道谱系考辨

黄 勇

提 要：《海东传道录》和《青鹤集》记录了韩国道教的传道谱系。作为史实，两个传道谱系均不可信。《海东传道录》的传道谱系反映了韩国内丹修炼派希望发扬光大道教的意愿；《青鹤集》的传道谱系则表现出一种强烈的民族主义文化心态。

黄勇，哲学博士，四川大学中国俗文化研究所副教授。

关键词：海东传道录 青鹤集 道教 传道谱系

一、引 言

道教在韩国已经有一千多年的历史，但是与儒、释两家相比，道教发展相对较为寥落。在韩国虽然也有道士和道观，却始终未能形成有社会影响力的教团组织，也未形成自己的经典体系。

韩国道教大体可分为本土仙家、科仪道教和修炼道教^①，其中科仪道教主要以道观为基地，其作用“仅限于祈求国泰民安、镇护国家，并不干预一般国民解决信仰问题”^②；修炼道教则以好道人士为载体，以宗教修炼为目的，在民间秘密传授。此外，道教的各种元素也有机地融入韩国文化之中，并与韩国本土巫俗信仰相融合^③，对韩国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。与中国道教发展史不同，道教在韩国文化中像盐溶于水一般，难以确考其发展演进的清晰脉络。尽管如此，韩国道教的历史也并非完全无迹可寻。韩国古代其实也有关于本国道教传承发展历史的记录。李朝时期（1392—1910）的著名道书《海东传道录》和《青鹤集》，就记载了修炼道派和本土仙家的道脉传授谱系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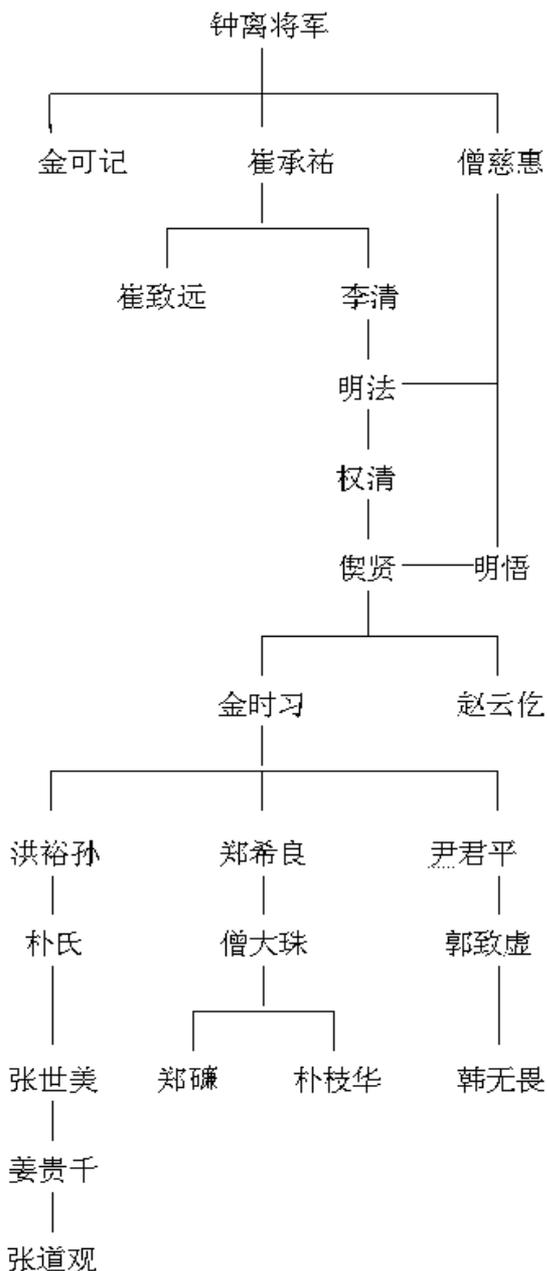
二、《海东传道录》所述道脉传承谱系

《海东传道录》是一篇只有2000字左右的短文，篇末附记曰：“万历庚戌十月二十四日……得阳子韩无畏临解谨记书于德川郡校后居。”^④据此可知，该书作者是韩无畏。鹤山辛敦复曰：“无畏，西原儒生也。少好任侠，擅西原官妓，

一日，杀妓夫，避仇入关西宁边，遇熙川校生郭致虚，学秘方，泛览仙佛。”^⑤可见，韩无畏是弃儒修道的落拓士人，是书作于万历庚戌（1610）。该书篇首题记称：“往在仁祖，有一僧游行至关东，忽被贼株连，持一钵囊，为官搜点，得一小卷，题名《海东传道录》。邑卒见而畏之，释其僧，致其书于泽堂李植。泽堂为之传于世。”此说亦得到李植的印证。不过李植说他是从赤诚县主簿金辑处得知此书，并于一山人处“固求得之”，并确认此书绝非“贗作之书”^⑥。

《海东传道录》主要记载修炼道派的传道谱系。据称，唐开元中，新罗人崔承祐、金可记、僧慈惠三人入唐游学，得天师申元之援引，遇正阳真人钟离将军。钟离将军认为“三人俱以微星下谪人间”，然而，“新罗国道教无缘，更过八百年，当有返还之旨，宣扬于彼，其后道教益盛，佛教渐微。……此三子生非其时，若欲学神仙，留在中华则我当指训”，“因以《青华秘文》、《灵宝毕法》、《金诰人头五岳诀》、《内观玉文宝篆》、《天遁炼魔法书》付之，且授以口诀”。三人得到传授后，“于石室修炼内丹，躬自供给，凡三年丹成”。后来，金可记留唐不返，崔承祐、慈惠航海东归。回国后，慈惠隐修于五台山，“承祐拜宏属陞太尉，以口诀授文昌侯（崔致远）及李清”。承祐93岁卒，以五种书“悉付清”。李清入头流山修炼得道，传道于弟子明法。明法又“质疑于惠公，尽得其要”。明法“三十二解去，以法授上洛君权清”。权清佯狂为僧，隐修于头

流山，后传法于偃贤。偃贤又得慈惠弟子明悟和尚的传授，易名为金孤云，传法于赵云伾和金时习。金时习传法于洪裕孙、郑希良、尹君平。洪裕孙传法于密阳孀妇朴氏，朴氏传法于张世美，世美传姜贵千，贵千传张道观。郑希良传法于僧大珠，“大珠佯狂，乞于通都，郑礪、朴枝华得其旨”。尹君平“以其道授熙川校生郭致虚”，韩无畏于妙香山金仙台遇郭致虚，得其法。据《海东异迹》记载，韩无畏亦有传人，为柳亨进^⑦。综上所述，《海东传道录》所述传道谱系当为：



《海东传道录》成书后，其所述传道谱系的真实性受到当时学者的质疑，如朴趾源就认为“韩无畏《传道录》所云，似涉傅会”^⑧。考诸史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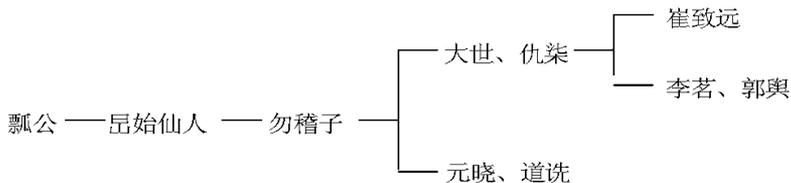
实，《海东传道录》所述传道谱系的确有许多可疑之处。例如，海东道脉的鼻祖钟离将军，即内丹学派的开创者钟离权，当是唐末五代人^⑨，申元之则是主要活动于唐玄宗时期的著名道士。据《云阜山申仙翁传》记载，申天师在天宝十四年（755）即已仙逝^⑩，他怎么可能援引崔承祐等人和唐末的钟离权相见？据《续仙传》记载，金可记于唐宣宗大中十一年（857）登仙^⑪；据《东国通鉴》记载，崔承祐于唐昭宗龙纪元年（889）入唐^⑫；僧慈惠即新罗高僧义湘法师，据何劲松考证，义湘法师入唐时间是龙朔二年（662），回国时间是咸亨二年（671）^⑬。三人年代相隔较远，如何在开元年间（713—741）一起去见钟离权？据李圭景《五洲衍文长笈散稿》引《海东传道录》，崔承祐等人见钟离权的时间是唐文宗开成（836—840）中^⑭。即使此说成立，崔承祐等人仍然不可能同时会见钟离权。由此可见，《海东传道录》所述之道脉源头是不可信的。海东道脉在韩国的传授亦颇多可疑之处，如僧慈惠比崔承祐至少早 100 多年，即使如《海东传道录》所说，他活到 145 岁，也不可能与崔承祐同时传道。再如，崔承祐为九世纪末期人，据《海东传道录》记载，偃贤是元朝人，又据《世宗实录·地理志》，偃氏本高昌国人，元季避兵赴高丽国^⑮，那么偃贤最早只能是十四世纪中期人，二人相隔至少 400 多年。但是，据《海东传道录》所说，从崔承祐到偃贤，只传授了四代。400 多年间只传四代，不合常理。又如，《海东传道录》说偃贤于正统（1436—1449）年间传法于金时习，时间跨度也未免过长。况且，金时习生于宣德十年（1435），即使把传法时间定在正统十四年（1449），他也才年仅 14 岁，绝非合适的传法对象。由此可见，《海东传道录》所述道脉传授谱系并不可信。

尽管《海东传道录》记载的传道谱系疑窦丛生，作为历史事实不可凭信，但也并不完全是空穴来风。根据该书所述，此传道谱系所传之道乃内丹之道，书后所附 16 条口诀，即《丹书口诀》、《丹家别旨》，以及北窗郑礪所著《龙虎秘诀》，皆是内丹修炼法门。另据《海东异迹》所载此谱系中一些人物的修炼事迹，亦可知其所修之道为内丹道^⑯。据张广保考证，钟离将军传授给崔承祐等人的 5 本道书，除《青华秘文》外都有事实根据，因此，内丹学在唐末传入韩国并非没有可能^⑰。其实，在韩国古代内丹修炼较为流

行，如南孝温《悼壶隐丘仲仁》诗曰：“壶隐先生我故人，声名四十一年春。铅埋永没铅光毙，墓木萧萧掩洞宾”；“治丹已领报衔轡，采药天台暗有期”^③，可见“喜仙而好名利”的丘仲仁所修为内丹之道。《芝峰类说》引《济川亭题诗》曰：“清秋扣柂骊江去，楼上何人识洞宾”^④，题诗者应为内丹修炼者无疑。此外，《海东异迹》、《五山说林》、《於于野谈》、《青庄馆全书》、《青鹤集》、《芝峰类说》、《五洲衍文长笺散稿》等韩国古书也记载了大量修道者的事迹，所修之道多为内丹道。不过，修道者大多道脉传承不详。虽然韩国古籍中没有留下关于本国内丹修炼派传道谱系的可靠记录，但是作为一种秘密流传于民间的修炼法门，内丹道必然有其传承系统。《海东传道录》所述道脉传承谱系虽然不可凭信，但是从该书引钟离将军之说，认为“更过八百年，当有返还之旨，宣扬于彼，其后道教益盛”，从唐文宗开成（836—840）年间到韩无畏著此书的万历庚戌（1610），又恰好接近 800 年^⑤，可以揆知，钟离将军之说应该是韩国内丹修炼派虚构的预言，这个预言实际上反映了内丹修炼派试图光大道教的意愿。

三、《青鹤集》所述道脉传承谱系

《青鹤集》，宣祖朝（1567—1608）落榜举子赵汝籍所著。该书记述了青鹤上人魏汉祚及其弟子的言行事迹，内容极其驳杂，涉及道教、政治、历史、理学、诗话、音乐、地理风水、讖纬思想、民俗信仰、神话传说、氏姓文化等诸多内容。该书叙述东方仙派曰：



《青鹤集》所说东方仙派之宗桓仁及桓雄、檀君，始见于《三国遗事》。据《三国遗事》记载，桓仁（《三国遗事》作桓因）是天神，桓雄是其庶子，下降太伯山，与熊女婚姻生檀君。檀君立国号朝鲜，御国 1500 年，“后还隐于阿斯达山为山神，寿一千九百八岁”^⑥。文朴氏，《揆园史话》称其为檀君朝鲜时人^⑦，《白岳丛说》则说他“得桓因之源，传为洁清之学”，承传桓因所著之《终书》^⑧。永郎为传说中的新罗四仙之一，《破闲集》、《东国輿地胜览》、《芝峰类说》、《海

桓仁为东方仙派之宗。桓雄天王，桓仁之子也，继志述事，又主风雨五谷三百六十余事，以化东民。檀君继业，化行十年。……其后有文朴氏，居阿斯达山，韶颜方瞳，能得檀君之道。永郎者，向弥山人也，行年九十，有婴儿之色，鹭羽之冠，铁竹之杖，逍遥于湖山，遂传文朴之业。马韩时有神女宝德者，御风而行，抱琴而歌，貌若秋水之芙蓉，是承永郎之道焉。

王宝高者，学金山人李纯者，习隐高士也，是乃宝德之分派也。^⑨

由此可见，东方仙派之道脉传授谱系当为：桓仁→桓雄→檀君→文朴氏→永郎→宝德→李纯→王宝高。不过，该书称李纯、王宝高为宝德之分派，而正脉所在却不得而知。

除桓仁所传之东方仙家道脉之外，《青鹤集》还记载了东方仙家之别派：

新罗初，有瓢公者自东海乘瓢而来，为罗国名宰，煮玉而食，茹木而衣，呼风唤雨，驱禽喝兽，其终也入雪岳山，是则仙家别派也。驾洛国房（居）登王时，有岳（岳）始仙人者，自七点山而来，貌滢寒玉，语类梵音……此则瓢公之流派也。勿稽子者，罗时名臣，有功不赏，携琴入斯彝山……是则七点之裔也。……大世、仇柴泛舟南海，元晓、道洗托身西教，是乃勿稽之余韵。崔致远……是得大世、仇柴之余风。其后清平山之李若、头流山之郭舆，是亦（大世、仇柴之）一派也。^⑩

据此可知，东方仙家别派的传授谱系当为：

《东异迹》等书都曾记录其事迹，是新罗时期（前 57—935）著名仙家，不过李暉光认为四仙其实是花郎徒，并非真仙^⑪。神女宝德，事迹不详，《揆园史话》、《白岳丛说》均称她传永郎之道，是马韩时人，与《青鹤集》之说相同。李纯，不知何许人，《青鹤集》外，诸书无载。王宝高，《东国輿地胜览》说他是新罗景德王（742—765）时人，曾创制玄鹤琴，后“得仙道”，常游于金鳌山琴松亭^⑫。

东方仙家别派之宗瓢公，始见于《三国史

记》。瓢公，《三国史记》作瓠公，《青鹤集》写作“瓢”，或因两字形似意近而误。据载：瓠公本是倭人，于新罗始祖赫居世时“以瓠系腰，渡海而来”^②。崑始仙人，驾洛国居登王（199—257）时人，曾与居登王会于招贤台^③。勿稽子，新罗奈解王尼师今（196—230）时人，因屡立战功却不得赏赐，“遂被发携琴，入师毘山不返”^④。元晓、道诜是新罗著名僧人；大世、仇柴则是新罗时期的好道人物，因向慕神仙之术，于真平王九年（587）往吴越求仙，“后不知其所往”^⑤。崔致远，新罗末期著名文人，曾在唐朝中科举，在韩国古代享有“东国文宗”之盛誉。郭舆，高丽睿宗（1105—1122）时人，是高丽时期著名道流人物，有“金门羽客”之称^⑥。清平山李茗，不知何许人。高丽时期号清平山人者有二：一为李岩，于恭愍王时（1351—1376）入清平山隐居^⑦；一为李资玄，亦是睿宗时道流人物，隐居清平山，睿宗累召不赴^⑧。郭舆与李资玄友善，二人有唱酬诗作传世^⑨。《青鹤集》将李茗、郭舆并举，据此推测，李茗或为李资玄之误。

据上述可知，《青鹤集》所述东方仙家道脉谱系中的人物，或为传说人物，或为实有其人的历史人物。以桓仁为宗的仙派谱系中，除王宝高有可能是真实人物外，其余都是神话传说中的人物；以瓢公为宗的仙家别派谱系中，除瓢公和崑始仙人充满神话色彩外，其他均为真实的历史人物。《青鹤集》以传说人物联缀的仙家谱系固不可信，以历史人物联缀的仙家谱系也同样可疑。以仙家别派谱系为例，暂且忽略瓢公和崑始仙人，从真实的历史人物勿稽子到传道链条末端的高丽人李茗、郭舆，时间跨度长达八、九百年，但是道脉流传却只经历了三代。由此可见，《青鹤集》所述道脉传承谱系是完全不可信的。

韩国古代流传着大量源自本土的仙家传说，《青鹤集》构拟的东方仙派道脉谱系，其实是对众多仙家人物之间道脉关系的梳理与整合，具有强烈的本土色彩。韩国学者车柱环认为，本土仙派具有警惕汉化，探索自主文化建设等特征^⑩。此说能否成立尚需商榷，但是以此概括《青鹤集》构拟的东方仙派道脉谱系，则颇能切中肯綮。《青鹤集》屡次精确预言甲申之变，据此推测，该书有可能最终完成于甲申（1644）之后。甲申之后正是韩国民族意识逐渐觉醒，民族主义思潮开始滋长的时期。《青鹤集》强调檀君朝鲜历史，强调本国人才不逊于中华，宣称“日月亡

于古月，古月亡于鱼羊”^⑪，朝鲜将“并吞日本，争衡中国”^⑫等等，都是民族主义思潮的具体表现；其构拟的东方仙派道脉谱系，其实也同样体现着强调本土文化独立性的民族意识。不过，此时尊华思想仍然是朝鲜王朝的主流意识形态^⑬。该书把东方道脉的源头追溯至中国，认为“桓仁真人受业于明由，明由受业于广成子”^⑭，则说明在这部强调民族意识的作品中，尊华思想的影响仍然挥之不去。

四、结 语

道教在韩国一直未能发展成制度性宗教。虽然高丽（918—1392）、朝鲜（1392—1910）两朝都有道观和科仪派道士，然而，科仪道教其实只是官方祭祀体系的组成部分，缺乏自身的独立性。其从事的斋醮活动主要是为国家祈福禳灾，并不关涉普通民众的信仰。因而，真正传承道教法脉的是那些散布于民间的修道人士，尽管这些人不一定具有道士的身份。修炼道派的成员大多是落第士子、遭受政治挫折的失意官僚、出身庶孽晋身无门的两班子弟，以及山林隐逸之士等边缘知识分子。《海东传道录》和《青鹤集》其实就是修炼道派的作品。

从事道教修炼者最早出现于新罗王朝后期，高丽时期修道者逐渐增多，到朝鲜王朝时期，修道者队伍已蔚为壮观。《海东异迹》等众多韩国古书中记录的大量修道之士，多数是朝鲜王朝时人，其所修之道主要是内丹道。《海东传道录》构拟的传道谱系中，自朝鲜王朝前期的金时习之后，人数骤然增多，其实也反映了这一史实。由此可见，到朝鲜王朝，内丹道已发展至鼎盛阶段。《海东传道录》所述传道谱系虽不可信，但它却反映了内丹修炼发展至鼎盛状态后，内丹修炼道派希望发扬光大道教的强烈意愿。

《青鹤集》大约最终成书于甲申之后。经历了惨烈的外敌入侵^⑮，以及由于明清鼎革造成的东亚文化共同体解体的巨大变动后^⑯，韩国民族主义思潮骤然勃兴，《青鹤集》其实就是这种时代思潮的产物。《青鹤集》构拟的东方仙派传道谱系虽然也承认“东方仙派之宗”桓仁的道脉源自广成子，但却异常强调此道脉谱系的本土特征。随着民族主义思潮的进一步发展，在成书于1675年的《揆园史话》中，便出现了“夫汉自汉，我自是我也，岂以堂堂震域，必拟汉制以后乃足乎”的与中国文化进行彻底切割的民族主义

文化心态，道教也便被解读成“承檀俭神人所创之源流”³⁸的本土文化。近世以来，韩国道教具有文化主体性，韩国文化对道教的吸收是主体性吸收的观点³⁹，成为一些韩国学者的基本论调。可以说，《青鹤集》正是引发此类观点之嚆矢。

(责任编辑：首之)

- ①③⑥ [韩] 车柱环：《朝鲜の道教》(日译本)，[日] 三浦国雄、野崎充彦译，京都：人文书院，1990年，第3—5、4页。
- ② [韩] 都珖淳：《韩国的道教》，见福井康顺等监修《道教》第3卷(中译本)，朱越利等译，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92年，第81页。
- ③ [韩] 李能和：《朝鲜巫俗考》，台北：东方文化书局，1971年，第57页。
- ④ [朝鲜王朝] 韩无畏：《海东传道录》，首尔：普成文化社，1998年，第262页。按：由于《海东传道录》篇幅较短，正文仅占3页，后文凡引该书正文，不再出注。
- ⑤ 《海东传道录》附录引辛敦复语，第265页。
- ⑥ 《海东传道录》附录引李植语，第264页。
- ⑦ [朝鲜王朝] 洪万宗：《海东异迹》，首尔：乙酉文化社，1982年，第251—252页。
- ⑧ [朝鲜王朝] 朴趾源：《热和日记》，上海：上海书店，1997年，第272页。
- ⑨ 卿希泰主编：《中国道教史》第2卷，成都：四川人民出版社，1996年，第735—739页。
- ⑩ 《云阜山中仙翁传》中的中仙翁名泰芝，其生平事迹与《仙传拾遗》、《龙城录》、《历代真仙体道通鉴》等书中的中元之相同，应是同一人。见《云阜山中仙翁传》，《道藏》第6册，文物出版社、上海书店、天津古籍出版社，1988年，第857页。
- ⑪ [南唐] 沈汾：《续仙传》，《道藏》第5册，第81页。
- ⑫ [朝鲜王朝] 徐居正：《东国通鉴》卷11《新罗纪》，首尔：景仁文化社，1974年，第257页。
- ⑬ 何劲松：《韩国佛教史》上册，北京：宗教文化出版社，1999年，第187、195页。
- ⑭ 参阅李圭景《五洲衍文长笺散稿》卷39《道教仙书道经辩证说》。另，《藏外道书》影印手抄本《海东传道录》亦作“唐开元中”，见《藏外道书》第31册第474页，成都：巴蜀书社，1994年。
- ⑮ 《世宗实录·地理志》卷150庆尚道“庆州府”条，《李朝实录》第11册，东京：学习院东洋文化研究所，1949年，第100页。
- ⑯ 《海东异迹》“权真人”条详细记录了南宫斗修炼内丹的全过程，辛敦复认为南宫斗即《传道录》中的偈贤。参阅《海东异迹》第228—233页，及《海东传道录》附录，第266页。
- ⑰ 张广保：《唐宋内丹道教》，上海：上海文化出版社，2001年，第97页。
- ⑱ [朝鲜王朝] 南孝温：《秋江冷话》，载《大东野乘》第1册，首尔：民族文化推进会，1967年，第704页。
- ⑲ [朝鲜王朝] 李晔光：《芝峰类说》上册卷13，京城：朝鲜古书刊行会，1915年，第87页。
- ⑳ 如果把传道时间定在开元(713—741)中，则已超过800年。
- ㉑ [朝鲜王朝] 赵汝籍：《青鹤集》，首尔：亚细亚文化社，1976年，第153、154页。
- ㉒ [朝鲜王朝] 赵汝籍：《青鹤集》，第153—154页。按：亚细亚文化社影印手抄本《青鹤集》，居登王作房登王，崑始仙人作崑始仙人。考诸《东国輿地胜览》、《海东异迹》等韩国古籍及普成文化社排印本《青鹤集》，均作居登王、崑始仙人，据改。
- ㉓ [高丽] 一然：《三国遗事》卷1纪异第一“古朝鲜”条，东京：东京帝国大学，1904年，第2页。
- ㉔④③ [朝鲜王朝] 北崖子：《揆国史话》，首尔：亚细亚文化社，1976年，第85、31页。
- ㉕ [韩] 李能和：《朝鲜道教史》引《白岳丛说》，首尔：普成文化社，1977年，第358页。
- ㉖ [朝鲜王朝] 李晔光：《芝峰类说》下册卷18，1915，第245页。
- ㉗ [朝鲜王朝] 卢思慎：《新增东国輿地胜览》第2册卷21庆州府“琴松亭”条，平壤：朝鲜社会科学院出版社，1959年，第23页。
- ㉘ [高丽] 金富轼：《三国史记》卷1《新罗本纪》第一，长春：吉林文史出版社，2003年，第3页。
- ㉙ [朝鲜王朝] 卢思慎：《新增东国輿地胜览》第2册卷32金海都护府“招贤台”条，第458页。
- ㉚ [高丽] 金富轼：《三国史记》卷48列传第八，首尔：景仁文化社，1973年，第395页。
- ㉛ [高丽] 金富轼：《三国史记》卷4《新罗本纪》第四，1973年，第39页。
- ㉜ [朝鲜王朝] 郑麟趾：《高丽史》第3册卷97，平壤：朝鲜科学院出版社，1958年，第218页。
- ㉝ [朝鲜王朝] 卢思慎：《新增东国輿地胜览》第2册卷32固城县人物“李岩”条，第486页。
- ㉞ 事见[高丽] 李仁老《破闲集》，首尔：亚细亚文化社，1972年，第22页；亦见《高丽史》第3册卷95《李资玄传》，平壤：朝鲜科学院出版社，1958年，第98页。
- ㉟ 赵季：《箕雅校注》卷7，北京：中华书局，2008年，第612页；亦见[高丽] 李仁老《破闲集》，第22页。
- ㊱③④ [朝鲜王朝] 赵汝籍：《青鹤集》，第217、170、152页。
- ㊲ 孙卫国：《大明旗号与小中华意识》，北京：商务印书馆，2007年，第419页。
- ㊳ 1592年(壬辰)、1636年(丙子)，朝鲜王朝先后遭受日本和女真的大规模入侵，几乎亡国，史称壬辰倭乱、丙子胡乱。
- ㊴ 葛兆光：《从“朝天”到“燕行”——17世纪中叶后东亚文化共同体的解体》，《中华文史论丛》总第81辑，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06年，第29—58页。
- ㊵ [韩] 都珖淳：《韩国的道教》，见福井康顺等监修《道教》第3卷(中译本)，朱越利等译，第44、77页；亦可参阅[韩] 朴正雄：《韩国道教的起源——韩国道教的自创论与外来传入论的比较》，《当代韩国》2011年夏季号。